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四編

林慶彰主編

第19冊

程明道思想與道家思想之交涉

葛世萱著

劉基「天人思想」之研究

林麗容著

劉基的聖人意識與詮釋

林麗容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程明道思想與道家思想之交涉 葛世萱 著／劉基「天人思想」之研究 林麗容 著／劉基的聖人意識與詮釋／林麗容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2+114 面／序 2+ 目 2+42 面／序 2+ 目 2+7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19 冊）

ISBN：978-986-322-029-9（精裝）

1.（宋）程顥 2.學術思想 3.中國哲學 4.（明）劉基
5.明代哲學

030.8

101015385

ISBN-978-986-322-029-9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322-029-9

程明道思想與道家思想之交涉

劉基「天人思想」之研究

劉基的聖人意識與詮釋

作 者 葛世萱／林麗容／林麗容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十四編 34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程明道思想與道家思想之交涉

葛世萱 著

作者簡介

葛世萱，1976年生於台北。台大中文系碩士畢，現為台大中文系博士候選人。曾先後任教於中國技術學院（今改制為中國科技大學）及世新大學，為兼任講師；目前則專志撰寫博士論文。自進入中文研究所後，即深感於宋明理學家之大儒風範，故矢志研究宋明理學。首先將重點放在北宋二程，特別是程顥，並以之為碩士論文之研究重心，本書即為碩士論文之再修出版。往後亦將以此為起點，期許自己能通貫上下、對宋明理學有更深入之探究。

提 要

理學為宋代融合佛、道思想而鎔鑄出之新儒學，於吸收他家學說、建立其道德本位之形上學後，終得以與佛、道思想抗衡，而取回儒家思想在中國學術史上的主導地位。程顥身為北宋理學重要奠基者之一，其思想亦呈顯出融合儒、道之特色，於其主要文本〈識仁篇〉、〈定性書〉中即可見之。然而，目前學界對明道理學與佛家交涉之研究，明顯多於討論與道家關係者；故筆者於此將專以道家思想為主，以明道思想與道家思想間之互涉關係為考論重心。

本文先以北宋學術發展及「反佛老」思想之演進為背景論述，其中顯見明道對道家思想之排拒，並不如對佛家般強烈。再進入中心思想之論述時，即由兩方面入手，一是「理」概念之定位，由先秦至魏晉道家「道」、「理」觀之演進，可見「理」地位之逐漸提升乃為一重要趨勢；故明道能夠以「理」代「道」，將儒家「誠」、「敬」、「中」、「仁」等道德觀注入虛位以待之「理」中，完成儒家之道德形上學，實與道家本身之思想發展亦相關。其次，就「性」論與工夫論來看，明道對「生命情性」之坦然面對，及其主張「去私」、「復初」等修養工夫，亦可見與道家學說之關聯。因此，由明道對道家、玄學思想之吸收與轉化，實可見理學思想在形成時之內在軌跡與脈絡。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理學與佛老思想交涉略論	1
第二節 動機與方法	5
第二章 明道「反佛老」思想之背景與態度	7
第一節 北宋初期之學術風氣	9
一、排佛老思想之發展	10
二、經學之革新	14
第二節 明道對佛老思想之評判角度	19
小 結	28
第三章 明道「理」概念之意義與定位	31
第一節 道家「道」、「理」概念之演進	32
一、先秦道家	32
(一) 老子	32
(二) 莊子	35
二、魏晉時期	38
(一) 王弼	39
(二) 郭象	42
第二節 明道「道」、「理」概念對道家思想之吸 收	46
一、論「道」	47
二、論「理」	51

第三節 明道天理觀之體貼與創發·····	56
一、論「誠」、「敬」、「中」·····	58
二、論「仁」·····	60
三、論「天人合一」·····	63
小 結·····	65
第四章 個人生命之完成——明道之性論與工夫 論·····	67
第一節 明道論「性」之雙重內涵·····	68
一、「道即性」·····	69
二、論「生之謂性」·····	73
第二節 明道「定性」工夫與道家思想之關係·····	80
一、去蔽·····	81
二、復初·····	87
第三節 「識仁」與「誠敬」——儒學本位之回歸 ·····	92
小 結·····	100
第五章 結 論·····	103
參考書目·····	109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理學與佛老思想交涉略論

理學興起之前，儒家思想已歷經了長期的衰落。西漢佛教傳入，經由帝王的支持，佛學開始持續發展。至魏晉時期，正值社會紛亂、政治動盪的局面，而新時代產生新課題，傳統儒家倫理思想亦受到挑戰，已無法成為人心價值之依歸。人心轉向的結果，佛家、道家思想大興，玄學成為時代潮流，清談蔚為風尚，並以《易》、《老》、《莊》思想為中心，提出嶄新的詮釋。同時，佛教經典不斷引入，理論愈趨精微，又以「格義」的方式拉近與中國原有思想的距離，於是佛、道思想成為主流，彼此互相激盪、愈益精進，且大思想家輩出。儒家則相形沈寂，限於經學桎梏，理論發展流於停滯，在哲學思想之高度上實無法與佛、道兩家抗衡。這種情勢一直持續到隋唐，而唐朝皇室特別崇奉道教，甚至將《老子》納入明經科中〔註1〕，成為考試舉士的標準之一。唐時佛、道二教盛行，其中又以佛教為甚，直至中唐韓愈出，提出〈原道〉篇振臂疾呼，痛斥佛、道二教對政治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要求恢復儒學正統，此為儒家反省思動的先聲。然而韓愈的儒學復興運動並未成功，排斥佛道二教、重振儒家思想的艱鉅任務，要到宋代理學興起後才真正達成。

〔註1〕 見宋·王溥：《唐會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7冊，史部政書類，1983年初版），卷七十五，「貢舉上·明經」：「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聖緒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實惟聖教，望請三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道德經》。……』」，頁607之149。

宋代儒家再起，除了政治上統一政權的政策需要、外患緊張情勢所喚醒的民族自覺影響之外，內在理論上的反省與革新更是重要因素。學者們極力排斥佛老，主張恢復儒學傳統，並勇於打破注疏，疑傳疑經，一改僵化學風，為儒學注入一股生命力。同時，為因應新時代重視心性問題的趨勢，以《易傳》、《中庸》等儒家傳統經典為根據，發展自孟子以後長期埋沒的儒家心性學。為處理這個對儒家來說相當生疏的哲學範疇，向其他學派吸取方法、理論的作法可說相當自然。而許多宋初學者們在反佛老的同时，往往已出入佛老多年，此亦是不爭的事實。於是理學與佛家、老、莊，甚至道教的關係，一直是個非常重要卻又相當複雜難解的問題。

而學者們亦相當重視對此問題之探討，即在宋代，「近禪」就是程朱學派普遍使用的學術批判名詞，用以表示一種偏離儒家正統的學說。而南宋學者葉適，已提出「程、張攻斥佛老至深，然盡用其學」〔註2〕的批評。明代學者黃綰、劉蕺山等人亦提及理學「近禪」的問題，至清代學者如顏元、戴震等對明末心學空疏的流弊感受深刻，因而對「宋學」的批判也更為痛切。直至近代學者的諸多學術著作，已累積了極豐富的研究資料。綜而觀之，主旨雖或有偏重，但無論偏佛或偏道，論述的中心就是：宋儒如何建構一套自圓其說的形上理論，並將之與傳統道德觀結合，為道德倫理建立堅實的理論基礎，並以此與佛老思想抗衡，取回儒家的正統地位。由此議題往外延伸，如社會背景、學術風氣等；往內延伸，如哲學術語、思想架構等，都在討論的範圍之內。由於佛教的發展、普遍程度勝於道教，特別是禪宗大盛，一般咸認佛家對理學產生的外在助力較道家為多，如修行生活的平民化、書院的產生、不立文字對經學的影響、「道統」的形成及語錄、學案體的流行等，都與佛教理論、制度相關〔註3〕。而這些由不同角度切入所提出關於外緣方面的討論，正可相互補充，逐漸貼近、還原理學發展過程的複雜情形。

至於哲學理論方面，各家說法之歧異性便增加許多。雖則理學發展過程

〔註2〕 宋·葉適：《習學記言》（台北：商務出版有限公司，四庫全書珍本三集，1972年初版），卷五十，頁11。

〔註3〕 說參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韓鍾文《中國儒學史·宋元卷》，頁60～90；杜松柏〈宋代理學與禪宗之關係〉、南懷瑾〈宋明理學與禪宗〉，見《宋明理學研究論集》。至於宋人疑經風氣之產生，還有另一種說法提出了魏晉玄學的影響，說參方東美《新儒家哲學十八講》，頁50、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頁30～32。

中「總攬百家」的特質已成為學界共識，如胡適主張理學是混合禪宗、道家、道教、儒教的產物：「其中有先天太極等等，是道教的分子；又談心說性，是佛教留下的問題；也信災異感應，是漢朝儒教的遺跡。但其中的主要觀念卻是古來道家的自然哲學裡的天道觀念，又叫做『天理』觀念，故名爲道學，又名爲理學。」〔註4〕錢穆亦以爲「理學家長處在能入虎穴得虎子，兼采道釋有關宇宙人生原則方面，還本儒學，加以吸收或揚棄，遂使孔子思想嶄然以一新體貌新精神，超然卓出於道釋兩家之上，而又獲一新綜合。」〔註5〕但進入更深細的探討之後，便出現了不同的主張，如陳寅恪認爲程朱之學與佛學關係密切：「采佛理之精粹以之註解四書五經，名爲闡明古學，實則吸收異教。聲言尊孔辟佛，實則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儒教之宗傳，合而爲一。」〔註6〕南懷瑾〈宋明理學與禪宗〉一文，主張「理學」就是宋代新興的「儒家之禪學」，認爲「在中國文化思想的領域裡，正式以『理』字作爲入道之門的，首先應從梁武帝時期，禪宗初祖達摩大師所提出的『理入』、『行入』開始。」〔註7〕並分別指出周敦頤遊心禪道、邵康節與曹洞宗、張載「大心」、二程「靜坐、用敬、致知」三部功夫與佛家思想之聯繫。郭朋《宋元佛教》中論宋代禪宗與程朱理學，則認爲最早將「理」視爲最高哲學範疇者，應是華嚴宗之法界說。而程朱學派關於「理」、「格物致知」、「心性」等學說，都受到禪宗相當大的影響〔註8〕。熊琬《宋代理學與佛學》主要討論朱子之學與佛學的關係，亦認同華嚴「理事無礙法界觀」對理學「理」概念之影響〔註9〕。

另一方面，陳少峰《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則主張「理學中表現形容本體之主要概念道體、天理（理）、無極太極、自然等等，與道家哲學的基本表述一致」〔註10〕，並分別指出北宋五子、朱熹、陸九淵、陳獻章、王陽明、

〔註4〕 見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胡適文存》第三集（台北市：遠東出版社，1990年出版），卷二，頁54。

〔註5〕 見錢穆：《孔子與論語》（台北：聯經出版社，1965年初版），頁176。

〔註6〕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頁10～11。

〔註7〕 見馮炳奎等著：《宋明理學研究論集》（台北：黎明文化，1983年2月初版），頁279。

〔註8〕 見郭朋《宋元佛教》（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初版），頁74～81。

〔註9〕 見熊琬《宋代理學與佛學》（台北：文津，1985年年4月初版），頁162～168。

〔註10〕 陳少峰《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頁14。

王龍溪之學術與道家思想的關係。而吳重慶〈論理學的道家化〉〔註11〕一文則指出在對人與萬物的關係、人性之看法、禮義人倫之自然無爲化及內聖外王的體系上，都表現出理學道家化的痕跡。還有主張宋明理學亦受到道教理論影響者，如張廣保〈論道教心性之學〉〔註12〕認爲理學的心性之學在多方面都是「步道教之後塵」，李大華〈宋明理學與唐代道教〉〔註13〕亦主張宋儒「博雜」、「遍求」的學術風格、合理與氣的本體論建構及性命觀與道教相關。盧國龍《中國重玄學》在敘述道教思想發展同時，亦指出「初期道教的道性論，對宋儒性理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註14〕，並將王玄覽、司馬承禎等道教大師之思想與程顥、周敦頤等理學家互相比較，進一步指出理論類似之處。

以上僅是略舉幾家說法，雖無法涵蓋所有，但已能看出議論範圍遍於宇宙論、心性論與工夫論，而特別集中於形上學的部分，如「理」、「心性」等概念上。這部分的歧見也最多。然如蔣義斌於《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王安石之融通儒釋及程朱學派之排佛反王》一書中，也承認了程朱學派用以批評佛學的利器，即所謂「氣化」之「實理」，是受道教的啓發而來〔註15〕；張永雋《二程學管見》中收錄〈淺述宋代理學宇宙論中之莊子成分——理學思想之一源〉一文，雖以莊子思想爲討論軸心，但亦於結論中特別指出理學淵源之複雜，「歸儒」、「融道」、「融佛」三部分缺一不可。〔註16〕由此可知，因論述主題之限制與區別，作者往往並未能對某概念或理論作出全面的剖析與整理。同時，也相對反證了此類問題在處理上之複雜程度。

〔註11〕 吳重慶〈論理學的道家化〉，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頁248～258。

〔註12〕 張廣保〈論道教心性之學〉，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七輯，頁1～17。

〔註13〕 李大華〈宋明理學與唐代道教〉，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頁310～321。

〔註14〕 見盧國龍：《中國重玄學——理想與現實的殊途與同歸》（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317。

〔註15〕 見蔣義斌：《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王安石之融通儒釋及程朱學派之排佛反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8月初版），頁201。

〔註16〕 見張永雋：〈淺述宋代理學宇宙論中之莊子成分——理學思想之一源〉，《二程學管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1月初版），頁336至337。

第二節 動機與方法

筆者在研讀明道思想及相關學術資料之際，發現幾乎每位學者都會提及佛、老思想的影響，然而眾說紛紜，各有立場，尚未見一系統性的整合論述出現。對於相同主題中出現的各種不同論述，該如何取舍判斷，是否能整合出一種結論或僅能並列以觀，一直是筆者思考許久的問題。一位哲學家獨特之創見，其後總有豐厚的前人思想、個人的思考傾向、交遊師友、成長環境及時代風氣等複雜因子為背景，而這些因子或顯或隱。閱其著作、理論自是瞭解一位哲學家思想的直接方式，但觀其曾受哪些理論影響、如何反思批判，再進一步形成自己的理論，亦即聚焦於其價值觀的取舍，或許更能深入一位哲學家的思想，知其好惡及立論的基礎、用意何在。

嚴格來說，若能將明道思想與佛家、道家、道教理論間之關係進行整合討論，當能更全面地掌握明道思想中所表現儒家與他家學說交流、融會之特色。然而這樣的討論便必須建立起一套相當龐大之架構，作者本身亦須對此四家之思想具備相當通徹的瞭解基礎，才能進行全面而客觀之觀察，使討論結果能公正而不失偏頗。故筆者於此選擇專注於研究道家與明道思想之關係，一方面是由於在北宋當時佛家思想雖明顯盛於道家，然明道文本如〈定性書〉、〈識仁篇〉中清楚使用的道家語彙，及其強烈排佛卻少批老、莊的言論，可見其與道家思想之關係相當引人深思；另一方面，目前討論明道與佛家思想交涉的學術資料，亦相對豐於討論與道家思想關係者。故本文將略人所詳，專以道家思想為主軸，期能由小而大，先徹底思考明道與道家思想間之關係，將此一端之問題釐清，往後再與佛、道教互看，進一步作全面之比較與整合。

因此，本文將「道家」之範圍限制於先秦老莊至魏晉玄學間之發展脈絡，亦即以學術性質之道家為討論對象。如此取舍並不表示道教思想中完全沒有學術性質之成分，道家老子之思想原本即是道教理論的重要來源之一，且於玄學思潮之後，隋唐道教「重玄學」之發展亦具備相當的學術意義，然因其最後仍以宗教性質為重，而道教學者亦往往從信仰之角度來詮釋老子思想，便與老莊、玄學家之哲學取向產生相當大之差異。另外，道教龐雜之宗教派別與經教體系整理起來更是相當複雜。雖然因此造成了時代之隔斷，無法解釋魏晉以後至宋初之間的道教興盛情形，但由於不易綜合討論，且其理論立場與道家、明道之主張亦相當不同，故此處仍暫將道教排除於討論範圍之外，

而集中於對道家思想之思考，並以此來反思明道理論架構之形成，期能從儒道融合的角度對明道思想作更進一步的分析與釐清。

於是，本文將先由明道本身之學術傾向與時代背景來看，探討明道對佛老態度之差異情形，並嘗試說明其受道家影響之時代因素。在討論過當時社會、學術發展的背景之後，則進一步由明道本身之思想來考索其與道家間之關係。這部分筆者將以前人之研究為基礎，而分別就明道「道體」、「心性」與「修養工夫」上所顯露之道家意涵來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希望能由「道家」與「儒家」兩端入手，探討明道究竟如何借用道家思想來輔助儒家思想，並以此建立一套儒家之道德形上體系。一方面將討論明道是站在何種角度來吸收道家學說，思考這些說法本身是否具備某些與儒家思想相近或互補之特質；另一方面欲探討明道如何將這些道家概念融入其儒學體系中，考索這些觀點融合在其理論各個層面中之具體表現，並試著推論明道採取這些方法之原因。筆者以思想之構成理路為脈絡來探討明道與道家思想關係之交涉，希冀能由此觀察理學發展初期儒道會通之特質，並能更進一步釐清明道思想形成之內在路徑。

第二章 明道「反佛老」思想之背景與態度

宋朝開國以來，政府對佛、道二教皆採正面扶持之態度。太祖甫即位，即解除後周世宗毀佛之令，其後的太宗、眞宗，亦以積極的行動來表示對佛老二教之支持。宋初這三位君王在位期間，除了多次下詔普度僧眾〔註1〕，亦喜大興華麗雕琢之寺廟、宮觀，不僅廣開佛、道之門，耗費鉅資，也很重視二家經典之保存與流傳。太祖乾德四年（西元966），曾派遣僧人赴西域求法〔註2〕；開寶四年（西元971）更敕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開雕大藏經〔註3〕，此舉對佛教之發展影響尤大。太宗於太平興國五年（西元980）詔建譯經院，對佛經翻譯之工作相當熱中，亦注重道教典籍之蒐集，計得七千餘卷，並命員校正。眞宗亦相當重視譯經工作，天禧五年（西元1021），更命宰相丁謂爲釋經潤文官。尤其大中祥符二年（西元1009），下令諸路州府軍縣開擇官地修建道觀或葺修舊觀，史載：「先是，道教之行，時習罕尙，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

〔註1〕 宋·釋智磐撰：《佛祖統記》（台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初版）卷四十三，頁394～396，記載太祖於解除佛禁時便設宴相國寺，普渡童行八千人；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西元976），下詔普度天下童子十七萬人。《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七，雍熙三年（西元986）十一月末附註中載太宗曾兩次普度僧眾，頁314之399。

〔註2〕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14冊，史部編年類，1978年初版），卷七：「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人，請遊西域。詔許之，仍賜錢三萬遣行。」，頁314之135。

〔註3〕 同註1，《佛祖統記》卷四十三，總頁396。

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註4〕此舉對道教之傳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於是在政府的鼓勵之下，真宗天禧五年，僧、道人數皆達最高峰，計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道士一萬九千零六十六人、女冠七百三十一人，而佛教更大勝於道教，為有宋以來人數最多之時期〔註5〕。

宋初政府支持佛道二教之原因，在認定其為穩固政治之手段。太祖多次探訪道士，對「無為無欲」、「愛民寡欲」等進言深表欣賞〔註6〕。太宗「素崇尚釋教」〔註7〕，相信「浮屠之教有裨政治」〔註8〕，也頻頻召見道士，陳搏便曾以「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向上進言，頗得歡心〔註9〕。真宗亦認為「道釋二門，有助世教」〔註10〕，曾撰〈釋氏論〉以主張釋氏與儒家周、孔之道「跡異道同」〔註11〕。然隨著社會狀況的變化，政府之態度亦有所改變，起初太祖雖鼓勵佛老，實則採取保護兼限制的措施〔註12〕，下令出家須試「經業」，限制諸州度僧名額，也嚴禁道教私度弟子，要求「素正道流」〔註13〕，可見其有鑑於前代之謹慎態度。之後，佛道人數劇增，逐漸產生許多社會、經濟方面的負擔與問題，而官方之因應方式是提高試業門檻，並對僧道之剃度年限、身份加強限制。如太宗雍熙二年（西元 985），詔令僧尼須讀經及三百紙，方可試精業；及至道元年（西元 997），驚於泉州僧籍之多，更詔加試唸誦〔註14〕。真宗咸平二年（西元 999），詔「尼年十五、僧年十八，方許剃度受戒，道士、女冠即依舊例，十八許受戒」〔註15〕；大中祥符六年（西元

〔註4〕 同註2，《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二，頁315之168。

〔註5〕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64年6月初版），〈道釋〉一之十三，頁7875。

〔註6〕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開寶二年（969）五月送太祖與道士蘇澄事，頁314之171；卷十一，開寶三年三月與處士王昭素的對話，頁314之180~181。

〔註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三，總頁314~263。

〔註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四，總頁314~355。

〔註9〕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6月初版），卷四五七，列傳第二百一十六，「隱逸上」，陳搏傳，頁13420~13421。

〔註1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三，頁315之40。

〔註1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五，總頁314~594。

〔註12〕 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天津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第二章，頁30~31。

〔註13〕 宋·李攸撰：《宋朝事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月初版），卷七〈道釋〉，頁281。

〔註14〕 同註5，〈道釋〉一之十五，總頁7876。

〔註15〕 同前註，〈道釋〉一之十七，總頁7877。

1013)，鑑於「歲放童行皆游墮不呈之民，靡習經戒，至有爲寇盜犯刑者，甚眾」〔註16〕，要求主首僧保明行止；天禧二年（西元1019）三月，更明令「祖父母、父母在，別無子息侍養，及刑責姦細惡黨、山林亡命賊徒、負罪潛竄，及曾在軍帶瑕痕者，並不得出家」，否則連帶處分容受寺觀及其親屬〔註17〕。由此可見，至真宗時佛道二教內部已漸非昔日之清靜，隱含之社會問題亦相當嚴重。

北宋初期學者強烈的反佛老運動即應運而生，他們向上繼承唐代韓愈反佛老之批判精神，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激烈地批判佛老盛行為社會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同時積極地肯定儒家思想對社會的安定力量。與韓愈之排佛運動不同者，北宋學者在批判佛老對社會經濟、倫理等方面之影響外，亦開始更深入地由理論著手，從思想基礎來動搖佛老思想之地位，而明道即是以此角度來批判佛老思想之代表性人物。能從思想角度來關佛，使排佛老由社會經濟等社會現象之層次進入精神層面，理論之深化是北宋排佛運動能夠跳脫韓愈失敗之前例而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另一方面，儒學的跨時代進步亦是重要因素，理學的產生使儒學能與佛老精微之形上、心性理論抗衡，重新取得當代思潮之領導地位。然而明道能就思想理論之層次來關佛老，姑不論其對佛老之理解是否精確，即代表明道其實亦已經過一番沈潛與比較，並且不僅明道，許多學者亦如此。這種現象反映了怎樣的時代學術風氣？而明道如何就思想層面來批判佛老？其思考之角度爲何？因此本章將討論北宋初期關佛老之說的演進，並討論當時的學術風氣對明道思想之影響，從而更進一步討論明道對佛老的批判角度與具體主張，以顯其理論特出之處。

第一節 北宋初期之學術風氣

社會上佛道二教盛行，對社會風氣、經濟造成極大的影響。而外交上，遭受外族威脅；內政上，種種政治弊端、社會問題亦一一浮現。各種衝擊之下，知識份子之自覺意識覺醒，希望在現實及精神層面上革新，不僅要重整吏治、解決政治外交上的困境，也要清整人心動亂之社會風氣。這種努力求變、希冀力挽狂瀾的積極態度不僅向外表現在對佛老的強烈反抗上，向內也

〔註16〕 同前註，〈道釋〉一之二一，總頁7879。

〔註17〕 同前註，〈道釋〉一之二二，總頁7879。

引起一波儒學革新之思潮。這兩股力量相輔相成、雙管齊下之結果，才真正打開了儒家的新視野，使儒學重新取得思想主流之地位。明道思想之展現，正是此學術風氣發展成熟之成果，因此本節將先討論宋初排佛老思想及儒學變革之發展情形，藉以釐清明道思想之時代及學術背景，說明其面對佛老態度之歷史因素。

一、排佛老思想之發展

在北宋對佛老採排拒態度之學者當中，第一位重要人物為孫復，其〈儒辱篇〉曰：

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給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註18〕

他清楚指出當時儒學地位之困境。以「滅絕仁義禮樂」的情形為「儒辱」，大聲疾呼佛老之徒僅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迷惑群眾，並站在重視政治教化的立場，認為這種以畏懼心理形成的信仰並不足恃，言下之意，真正的價值標準應是超乎生死的，而非要求福報而已。佛老信仰徒使人爭相追求外在的崇奉，紛擾天下，不僅不能帶給群眾心靈的平靜，更造成社會經濟的亂象。孫復標舉儒家，並提出了一系列的典範，在〈答張洞書〉中指出：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眾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於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註19〕

此言作文標準，於內容上排斥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於形式上反對華美虛浮之詞，而主張載道之文。其所載之道，必須是學者已得之於心之道，為個人內

〔註18〕孫復：《孫明復小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0冊，集部別集類，1978年初版）頁37，總頁176。

〔註19〕同前註，頁31～32，總頁173～174。